紫禁城小朝廷的社会史研究

Research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Little Court in the Forbidden City, 1912-1924

刘　平　孙　昉

Liu Ping, Sun Fang

内容提要：

紫禁城小朝廷是北洋政治与北京社会结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探讨其十二年面貌及其内外关系，有益于深化民国前期历史与北京社会史研究。小朝廷经济政治地位的弱化，使得其内部矛盾不断发生。外部时尚信息不断冲破守旧王公大臣的阻挠，闯入小朝廷的日常生活，溥仪、溥杰等人崇尚时尚，接受新观念，主动剪辫，参与慈善活动，裁撤太监。小朝廷之政治社会生活的断裂和重组虽然都带有无奈的色彩，但在客观上维护了一个社会群体的稳定。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再次造成小朝廷社会生活的断裂，并且孕育出新的危机——国内的压制与外国的引诱，使得小朝廷重新燃起复辟的希望。

关键词：

小朝廷　日常生活　溥仪　复辟

ABSTRACT:

The Little Court in the Forbidden City was a tremendous group in the BeiYang politics and Beijing's social fabric. The research of the twelve years of their appearance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is beneficial for deepening the research of social history and the social history of Beijing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weakening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Little Court caused the internal conflict. External fashion information broke through the obstruction of the conservative nobles and entered into their daily life. Pu Yi and Pu Jie advocated fashion, accepted new ideas, cut brai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charitable activities, and dissolved the eunuch. The fracture and reorganization of social life had the tragedy color but in fact it has maintained society stable. Pu Yi was evicted by Feng Yuxiang from the forbidden city in 1924.It caused the fracture of The Little Court again, and have hidden new crisis——the domestic repression and foreign temptation. It renewed hope of restoration of The Little Court.

KEY WORDS:

The Little Court, Daily life, Pu Yi, restoration

一 紫禁城小朝廷 ：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 ～ 1928）是一个常有常新的研究领域，北京社会史则是目前日渐活跃的一个领域。从 1912 年 2 月溥仪宣布退位，到 1924 年 11 月鹿钟麟强行驱逐溥仪一行出宫，这十二年是逊清小朝廷居留北京紫禁城的时期，占了北洋时期的四分之三时间。目前，关于北洋军阀史、北京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已经趋于多样化，研究成果繁多，但对紫禁城小朝廷这个颇具政治色彩的社会群体的研究则尚未充分展开。

紫禁城小朝廷是北洋时期北京社会结构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清朝结束、民国临时政府北迁后，北京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形成了“上至大总统，下至挑粪桶”的层次有序并且板块交错的动态社会格局。原本旗汉、官民分割的城市空间布局开始瓦解，但紫禁城小朝廷是一个例外。恪守清朝典章制度、宣统纪年、服饰装束以及生活习惯的小朝廷与宫墙外的社会之间构成了明显的时空差异，这种外在的时空差异又深深地内化到小朝廷的社会心态之中。

在政治上被视为“封建标志”的小朝廷是不能脱离于近代北京社会史研究视野之外的，正如没有胡同、四合院和金銮殿，就没有物质意义上的古都北京一样，以紫禁城小朝廷为观察对象，放大若干细节，可以看到诸多以前人们未曾关注的现象。小朝廷虽然失去君临天下的权力，龟缩于紫禁城之内，但是其内部仍然保持着高度缩微化的君臣结构——由溥仪与前朝亲贵遗老王公大臣、同光两朝后妃以及宗室子弟、太监宫女仆役等主次群体组成。小朝廷虽然“小”，但上述群体在年龄构成、性别和观念行为上都有明显区别，外表看似简单的关系实则蕴含着比较复杂的矛盾。上层之间围绕着对小朝廷的主导权，彼此明争暗斗；亲贵大臣对太监宫女仆役的苛虐激化了主仆矛盾；小朝廷与外界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在紫禁城后庭这个狭小而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重重矛盾所积聚的能量产生了种种爆炸效应，或震动其内部，或影响其外部。

小朝廷与外部世界关系之演变更是值得深思。小朝廷除了张勋复辟期间一度给北京市民造成惊扰外，基本上没有和北京市民发生尖锐冲突，北京社会也普遍接受了小朝廷的存在。反之，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种种波澜〔图一〕未曾波及小朝廷；后来肇始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大事件也没有对小朝廷造成冲击。由此可见，相对隔绝的小朝廷颇有神秘色彩，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很难用简单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对立关系来加以概括。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十二年也是小朝廷所占据的空间逐渐向社会开放的过程——尽管极为迟缓而有限。颐和园成为供公众游览的公园，一些中外名流应邀进入紫禁城。同时，小朝廷的整体社会形象也在毁誉不一的舆论中发生变化——既有图谋复辟、盗卖古玩字画等负面形象，也有积极参与慈善活动的正面形象。虽然拒绝融入民国政治体制，但是小朝廷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界社会的影响，溥仪和其他青少年皇室子弟对时尚生活的追求与模仿，导致了他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溥仪断然下令在紫禁城剪除发辫就是观念变化所造成的身体外观变化。小朝廷这种对时尚的追求和谋图复辟的期望，构成了一种错位心态。

小朝廷的核心人物——末代皇帝溥仪一直是文艺界的热门描述对象。1988 年，意大利导演贝尔纳多·贝尔托鲁齐（Bernardo Bertolucci）执拍的《末代皇帝》和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先后走进

千家万户，引起一股热潮[1]。此后，类似的文艺作品相继出现。近年来，辽宁芭蕾舞团还用芭蕾舞的形式演绎溥仪及其妻妾的悲剧人生。这些作品大都以溥仪的人生历程为主线，以“皇帝—租界寓公—伪满傀儡—战犯—公民”的身份转换为节点，来描述溥仪的种种不幸——残缺的童年、扭曲的亲情、虚伪的爱情、屈辱的尊严等。但是受主题限制，这些作品大都没有（无法）描述小朝廷的时空演变。



图一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致宣统逊帝“国书”

在既往研究中，紫禁城小朝廷是作为辛亥革命不彻底的“尾巴”之一，或是伪满政权的背景资料来认识的，相应的学术成果大都集中于政治史方面（尤其是张勋复辟一节），对小朝廷的社会史研究甚为稀少。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成果是我们向前拓展的基石，这里先做一些简要归纳。

（一）小朝廷与民国政府的关系。章开沅、刘望龄发表于1964年的《民国初年“遗老”们的复辟活动》，虽然带有那个时代的政治痕迹，但是也注意到复辟势力对社会舆论的争夺[2]。有学者认为民国政府对逊清皇室从稍加控制到放任不管，冯玉祥的驱逐行动造成了刺激溥仪勾结外人、图谋复辟的消极后果[3]。

（二）逊清遗老的心态和行为。遗老是与小朝廷关系极为密切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他们的活动不限于北京，那些散居于北京、天津、上海和青岛等地的遗老往往被作为一类具有共同政治符号的人物加以研究。有学者曾经探讨遗老们的生死节义观，认为他们的观念很难得到当时主流社会的认同[4]。但是，遗老如何扭曲小朝廷对外部社会的认识却有待深入研究。

（三）小朝廷的日常生活变迁及其与北京市民阶层的关系。赵雅丽认为，小朝廷已经趋于时尚化，在生活习俗上与社会民众的心理产生了互动与协适[5]。这一研究成果具有突破性意义，但仍有若干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例如小朝廷在生活上对外部社会的依赖，两者在社会心理上的某些相通之处，比如对民国政局动荡的不满，还有逊清小朝廷改善自身社会形象的动机和效果。

（四）小朝廷与北京旗人群体的关系。刘小萌在其所著《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叙述了贫困旗人对小朝廷的期待和小朝廷的无奈[6]。常书红的博士论文《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论述了北京旗人贫富分化的过程，

1 相比而言，这两部同名的故事片和电视连续剧虽然所用的叙事线索相似，但是侧重点不同，影片比较深入地发掘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种种迷惑与纠结，而电视剧的重点在于描述内外因素对主人公性格和政治取向的影响。

2 章开沅、刘望龄：《民国初年“遗老”们的复辟活动》，《江汉论坛》1964年第4期。

3 喻大华：《论民国政府处理逊清皇室的失误》，《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4 王雷：《民国初年生存空间的歧异——前清遗老圈里的生死节义》，《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5 赵雅丽：《逊清小朝廷时期宫规习俗的变迁与动因之考察》，载袁樊栓主编：《北京风俗史研究》，燕山出版社，2007年。

6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第8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并批评北洋政府救济旗人的作为不力[1]。但小朝廷何以未能在救济旗人群体一事上发挥作用，而是自甘封闭，或者祈求渺不可及的复辟，正是人们应当着力探讨的问题之一。

关于近代北京社会史（特别是北洋时期）的研究，虽然有学者触及北京市民阶层的诸多方面，但是对小朝廷的社会活动仍未予以应有的关注。袁熹的《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只是注意到依附小朝廷的前清宗亲勋贵在民国时代的败落现象及其原因，并未将触角深入到紫禁城内部[2]。有关北京的综合性、通史性研究，例如近年出版的《北京通史》，也许是受体例的限制，也未能充分展开对小朝廷历史的叙述。

（五）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例如溥仪的英籍教师庄士敦于 1934 年所著《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3]，清宫史专家秦国经所著《逊清皇室轶事》[4] 等书，既有史料价值，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虽然经过老舍等人的润色加工，但仍然比较真实地透露了溥仪在紫禁城成长时的心态世界。经王庆祥整理的《溥仪日记》保存了 1914 ～ 1921 年的日记（缺 1919 年和 1920 年）[5]。虽然日记不全，但是比较确切地反映了溥仪在大婚之前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以及遗老对他早年成长的影响。一些小朝廷成员也留下了回忆录，如《溥杰自传》，但是这种时隔多年所形成的史料，更多的是表现传主如何融入新中国的历程，多少带有修正记忆的痕迹，这是我们在研究中不能不注意的。

通过对相关学术史研究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对于小朝廷的生存空间、内外关系、社会行为和心态，已有涉及者，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未有研究者，必须予以重视。本文运用社会史研究的视角方法，以政治、生活两个层面为基本内容，初步探讨逊清小朝廷在民国首都生存生活的十二年面貌，以期深入认识小朝廷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紫禁城这一特殊空间，深化北京社会史研究。

二　小朝廷社会群体的形成与内部结构

小朝廷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由清皇室蜕变而来。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后，清朝统治迅速走向崩溃，作为清朝统治核心的皇室也走向弱势化。隆裕太后把镇压革命军的希望寄予袁世凯，委以大权，但在稍后的南北和谈中，北京代表无一皇室成员，尽管关于皇室的未来处置问题是南北和谈的重要内容之一。

直到南北和谈代表基本达成共识，隆裕太后才开始和袁世凯就皇室未来的命运讨价还价。其间，除少数青年强硬派如良弼、载泽等人外，其他男性亲贵包括载沣、载洵在内，大都陷入“集体阳痿”状态，由这个四十来岁的女人从头到尾、锱铢必较地操办爱新觉罗家族的命运。极为不满的隆裕太后对一言不发的载沣抱怨道：“你们都是要我承担耳。”[6] 清帝退位前的宫廷内部关系对日后紫禁城内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清朝皇室以放弃全国统治为代价，换取了继续居留北京的权利〔图二〕，避免了像元顺帝放弃大都、北

1 参见常书红：《辛亥革命前后的满族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

2 参见袁熹：《近代北京的市民生活》，第 5 ～ 8 页，北京出版社，2000 年。

3 中译本由求是出版社 1989 年出版，译者陈时伟等。后来，该书中译本数种相继出版，如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7 年版，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4 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紫禁城出版社，1985 年。

5 溥仪著、王庆祥整理：《溥仪日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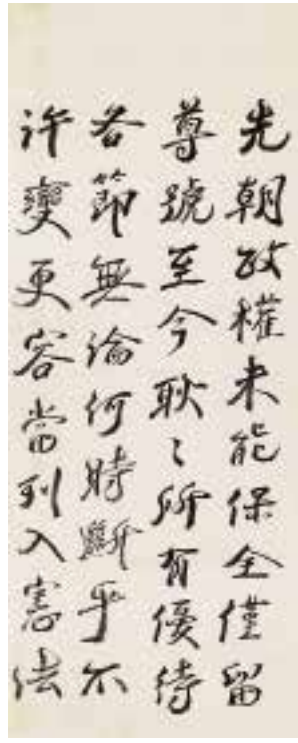
6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之一），第 309 页，龙门联合书局，1958 年。

逃蒙古大漠那样的命运。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正是在这种“孤儿寡母”的形象中，不由自主地与其他社会群体一起迈进了民国时期。

小朝廷所处的日常活动空间极为狭小而且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小朝廷的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空间被挤压在紫禁城的后半部分（一般称为“后庭”）。体现国家权威的大型祭坛如天坛、地坛等处都不再属于小朝廷。当时属于小朝廷的土地尚有颐和园、太庙和清朝帝陵，但是这些区域互不连接。而且，民国政府迟迟没有履行将小朝廷安置颐和园的承诺。

虽然小朝廷的生活空间只是昔日帝都的一小片中心区域，但是其内部仍然有明显的、复杂的主次上下关系。小朝廷社会群体大致由五个板块构成：

（一）“皇帝”溥仪和其他青少年宗室成员，如入宫伴读的溥仪胞弟溥杰、载涛之子溥佳和溥伦之子毓崇等。后来归嫁溥仪的“皇后”婉容和“皇妃”文绣作为青年女性成员也属于这一群体。这些人员普遍低龄，性格处于成型期，对外界事物比较好奇，比较反感琐碎的宫廷礼仪，但是又无法挣脱宫廷生活的束缚。



图二　袁世凯关于保留皇室优待条件的手迹

（二）已经中年的宣统朝少壮亲贵，如前监国摄政王载沣、前军谘部大臣载涛、前度支部大臣载泽和溥伦等。这些人虽然曾在三年的宣统朝时期操控军政大权，但在政治上缺乏远见，对复辟之事悲观，生活上日益贪图安逸。

（三）同治光绪时期的后妃，这些人有隆裕太后叶赫那拉氏、端康太妃他他拉氏（光绪帝瑾妃）、庄和太妃阿鲁特氏（同治帝珣妃）、荣惠太妃西林觉罗氏（同治帝瑨嫔）、敬懿太妃赫舍里氏（同治帝瑜妃）。这些原本受慈禧太后长期压制的后妃，在小朝廷里颇有权力欲望，彼此明争暗斗。

（四）在紫禁城效力的非宗室遗老大臣，如陈宝琛、郑孝胥、陆润庠、绍英等。这些人均系“忠臣”，官场斗争经验丰富，在政治上仇视民国，排斥新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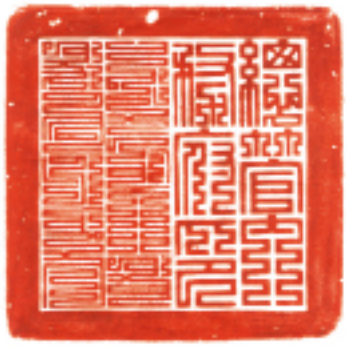
（五）宫内太监宫女仆役，处于小朝廷社会的最下层。虽然受到上层的歧视和虐待，但是他们已经无法离开紫禁城，融入外界的社会生活。

在此，还应该提到一个难以构成板块，却对小朝廷内部关系和心态都有重要影响的特殊人物——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这位独身未娶的苏格兰人是溥仪的英文教师，多年致力于向小朝廷的青年成员介绍西方文化，也加剧了溥仪等人与小朝庭的中老年成员的观念冲突。

三　困窘的处境

小朝廷所付出的代价并不止于皇帝退位，更大的代价是从此丧失了对全国经济资源的控制和调取，此时的小朝廷风光不再，只能仰赖民国政府的固定拨款和少数忠于朝廷的遗老们的些许“报效”来维持基本生活和排场。1912 年，为接待北上来京的孙中山，小朝廷颇费周折：“此次恭请孙中山预备酒筵，或照总统府、





图三 “总管内务府”印

或仿外交部样子办理为妥。若用膳房菜品，此次开支又不得了……。”[1]

由于经济资源的匮乏，小朝廷的日常开支变得困难，如何缩减行政经费成为小朝廷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1914 年 7 月 9 日，小朝廷以溥仪名义颁布裁减内务府人员的谕旨，将上驷院、武备院和奉宸苑归并于内务府，各司处人数共裁撤 272 名人员。1922 年，内务府再次裁减人员 308 名[2]。但是这些裁员举措并未从根本上减轻小朝廷的财政危机。

与经济地位弱化同步的是政治地位的弱化。民国政府优待逊清皇室，并保留尊号的做法在历史上有成例可循。曹魏代汉后，魏文帝曹丕封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并以河内郡山阳县为采邑，“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上书不称臣，京都有事于太庙，致胙;封公之四子为列侯”[3]。刘协平安度过十四年余生。西晋取代曹魏，年仅 20 岁的曹奂退位，被司马炎封为“陈留王”，以 58 岁之龄善终于洛阳金墉城。但更多的事例是处死前代帝王，或驱逐于边疆。清朝入关后，不遗余力地网罗诛杀南明藩王和宗室成员，就连归顺清朝的朱常涝也被斩首。因此，逊清皇室没有遭受大规模报复，能在北京享受优待条件算是极为幸运的。但民国政府在优待小朝廷的同时，也冻结了他们的政治权利。1913 年第一届国会时，参众两院都没有为小朝廷安排名额，也没有文献记载表明有小朝廷成员参加了议会选举或竞选议员。直到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才有一个名叫毓朗的宗室成员出任国会议员[4]。但是毓朗并非作为小朝廷的代表参加国会。

由于民国政府长期拖延支付小朝廷经费，加之严加限制小朝廷的政治活动，一些遗老多有怨言。如王国维就曾赋诗：“宣室遗言犹在耳，山河盟誓期始终。寡妇孤儿要易欺，讴歌狱颂终何是。”[5]但这种愤懑终究无法得到外界社会的共鸣。

由于在国家政治事务上无法作为，小朝廷所能处理的政务仅有日常宫廷琐事和遗老陈奏。由于军机处和内阁都不复存在，谕旨发布和接收奏章由内务府〔图三〕负责，宗人府则继续负责宗室谱牒、爵禄、赏罚、祭祀等事务。内务府和宗人府遂成为小朝廷的“施政”机构，尤其是主持日常事务、掌管经费的内务府显得格外重要，成为亲贵和遗老们互相争权的对象。由于内务府理财乏术，贪墨横行，庄士敦鄙夷地将其称作“吮干了王朝血液的吸血鬼。”[6]

1 “总管内务府大臣绍彝函件”，转引自晓尧：《几页书札，一段历史——孙中山先生 1912 年在北京会晤摄政王载沣之探源》，《艺术市场》，2003 年第 2 期。

2 秦国经：《逊清皇室轶事》，第 10 ～ 11 页，紫禁城出版社，1985 年。

3 陈寿：《三国志》卷二，“文帝纪”。

4 爱新觉罗·毓朗（1864 ～ 1922），溥煦次子，字月华，号余痴，别号余痴生。光绪十二年（1886）封三等镇国将军，三十三年（1907）袭多罗贝勒，历任宗人府左宗正、军机大臣上行走、巡警部侍郎等职。宣统二年（1910）授军机大臣。1911 年改授军大臣。辛亥革命后曾参与宗社党活动。死后谥“敏达”。

5 王国维：《颐和园词》，陈永正校注：《王国维诗词校注》，第 102 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年。

6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 157 页，求是出版社，1989 年。

这些身份和观念都有明显差异的成员共处于狭小的紫禁城后庭，不可避免地延续着惯有的宫廷内部斗争，而日益紧张的经济资源和衰退的政治地位更使得这些矛盾趋于表面化。

四　小朝廷的内部矛盾

围绕着小朝廷的内部控制权，衍生出一系列尖锐矛盾。除了内务府和宗人府外，后宫同样阴云密布。小朝廷初期，隆裕太后对同光遗妃极力压制，瑜、珣、瑨三妃被打入冷宫，以珣妃为例，她在西六宫孀居达三十余年。瑾妃虽然没有被打入冷宫，却也无法享受溥仪“庶母”的待遇。吃饭时，隆裕和溥仪坐着，而瑾妃却要站着[1]。可以说，在 1913 年前，对溥仪的监护完全由隆裕太后所操控。



图四　“皇后”册文



图五　“淑妃”册文

1913 年 2 月隆裕太后死后，健在的同光两朝妃嫔向王公大臣讨取名分，总算取得太妃的称号，而溥仪也一律称她们为“皇额娘”，向四大太妃请安也就成为其刻板宫廷生活的内容之一，他在 1915 年 9 月 11 日的日记中记载：“上储秀宫诣庄和皇贵妃行三跪九叩礼。”[2]1918 年 1 月 18 日记载：“如四宫请安。”[3]

这些补偿心理严重的四宫太妃展开明暗争斗。一时间，小朝廷后宫不断演绎“四宫之争”，目的是设法争取溥仪站在自己一边。这些早年寡居的太妃长期幽居紫禁城，对外界知之甚少，其作为近似于外面大户人家内部的妻妾之争。她们的所作所为给成长中的溥仪等人留下了难以消弭的阴影。特赦后的溥仪如此感慨道：“我虽然有过这么多母亲，但并没有得过真正的母爱。”[4]

四宫太妃也甚为遗老所反感。年龄渐长的溥仪在遗老大臣支持下，与太妃们的矛盾日渐表面化，最明显的表现是确定后妃人选一事上。太妃们在溥仪婚事上各自施加影响。溥仪起初中意额尔德特氏的文绣，敬懿太妃甚为高兴，端康太妃却拒绝接受，向溥仪推荐来自郭布罗氏的婉容。溥仪对于端康太妃的干涉颇为反感，后在王公大臣劝说下，分别将婉容和文绣封为“皇后”〔图四〕和“淑妃”。〔图五〕

1　参见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33 页，群众出版社，1964 年。
2　溥仪著、王庆祥整理：《溥仪日记》，第 14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
3　溥仪著、王庆祥整理：《溥仪日记》，第 29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
4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33 页，群众出版社，1964 年。

溥仪与父辈的中年亲贵成员虽系父子或叔侄，但同样存在权力之争。张勋复辟之时，宗室少壮派王公企图恢复控制宫廷的权力，兴奋不已的载沣打算让载涛出任“禁卫军司令”，遭到陈宝琛、许宝蘅等人反对。溥仪得知此事后，十分恼怒，向陈宝琛发出“以后不准亲贵稍有干预”的“谕令”[1]。

小朝廷末期，非宗室的遗老与宗室亲贵的矛盾围绕整顿内务府再次激化。溥仪大力裁撤太监后，又对历来由“上三旗”王公主持的内务府进行整顿，任命郑孝胥为“总理内务府大臣”。1924 年 5 月，溥仪命庄士敦管理颐和园。然而，这些举措很快遭到满族王公的反对。郑孝胥称病辞职，仍由绍英掌管内务府。

遗老、王公虽然不似太妃那样直接图谋控制溥仪，但仍然尽力阻止溥仪接触外界，防止他消泯复辟的志向或离开紫禁城。在他们看来，溥仪关系到小朝廷的优待条件的存废。正如某遗老所说：“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自己偏要先放弃他呢？”[2]

进入青春期的溥仪开始产生强烈的叛逆心理，加剧了他和宫中长辈的紧张关系。溥仪本人也说：“自从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王公大臣们的眼里逐渐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3] 溥仪十五岁那年，听说父亲载沣在醇王府安装了电话，就命令绍英在养心殿内安装电话。绍英让陈宝琛等人劝说溥仪放弃这一念头，理由是：“这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祖宗也没有这样干过，……这些西洋奇技淫巧，祖宗是不用的。”溥仪以皇宫有自鸣钟、洋琴、电灯这类“西洋玩意”的事实予以反驳。但是这几位师傅仍不罢休：“外界随意打电话，冒犯了天颜，那岂不有失尊严？”[4]

溥仪与那些同处青少年时代的兄弟子侄的关系上，君臣名分的色彩较淡。溥佳曾回忆道，他和溥仪在游玩中把“君臣”关系抛弃一边，“有时也打成了一团，因此彼此之间是非常友爱的”[5]。溥仪和这些大致同龄的亲贵成员的亲密关系一直维持到伪满时代[6]，但这类同龄亲属的温情关系并非宫廷生活主流。

小朝廷内部贵族与太监之间的主仆关系也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民国政府一再要求小朝廷废止太监制度。1915 年 12 月，即将称帝的袁世凯重申这一要求：

> 历代宫禁，沿用阉人，因供内廷使命，俾千百无辜之民，自处以久废之宫刑，……所有从前太监等名目，着即永远革除，悬为厉禁。内廷供役，酌量改用女官[7]。

但小朝廷对此置若罔闻，甚至有少数民间贫困男童被家人私自“净身”后，送入宫中当太监，如末代太监孙耀庭就是其中之一。宦官制度的顽固存在，使得太监也有可能卷入小朝廷上层的矛盾，四宫太妃就仿效

1 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二册，第 597 页，中华书局，2011 年。

2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82 页，群众出版社，1964 年。

3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82 页，群众出版社，1964 年。1918 年 8 月，庄士敦成为溥仪的“帝师”，次年 2 月，庄士敦正式开始其“帝师”生涯。

4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84 页，群众出版社，1964 年。

5 爱新觉罗·溥佳：《溥仪出宫的前前后后》，《溥仪离开紫禁城后——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回忆》，第 4 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年。

6 溥仪之妹韫颖（人称三格格）在给身为伪满“皇帝”的溥仪的信中，署名“莉莉”，所用笔调亲密随和：“皇上为什么那么懒，总不写信？太可气了！莉现于暑假，终日无事。昼间因热气蒸人，直不能读书。夜间尚属凉爽，每日在夜间自习两钟头。”见秦翰才：《满宫残照记》，第 79 页，岳麓书社，1986 年。

7 “大总统着永远革除太监申令”（1915 年 12 月 23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护国战争》（民国史档案资料丛书），第 148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年。

慈禧，指派亲信太监监视溥仪。不过溥仪虽然在日常生活上依赖太监的伺候，但他对太监并不信任。由于宫廷经费紧张，太监待遇也受到牵连，一些太监利用监守之便，盗卖宫廷古玩字画，引发舆论谴责，溥仪知道后决定裁撤太监，遭到太妃和王公大臣的反对："自醇邸、师傅以次，莫不力阻，而上力行之；然太妃以无人执役，复召回百余人。"[1] 最终溥仪还是裁撤了大部分太监〔图六〕。



图六　小朝廷时期的太监档册

由于宫廷服役之事并未减少，溥仪只好招雇了一些体格健全的新仆役。这些出身北京市民家庭的青少年仆役不同于生理心理都比较变异的太监，他们与主子溥仪的关系比较协调，比如溥仪对李国雄就颇为倚重。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后，暂居醇王府的溥仪没过多久又把遣散回家的李国雄召回[2]。后来，李国雄一直陪伴溥仪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根据优待条件，小朝廷仍然保留少量禁卫军，归陆军部编制。1912 年 2 月，北京发生兵变，北洋第三镇士兵以索饷为由，持械闹事，从地安门到前门大栅栏一带繁华之地，都遭到乱兵抢劫，商民损失惨重，但小朝廷却没有受到惊扰，"两日浩劫而皇城安堵，皆禁卫军之力也。"[3] 由于这些禁卫军直属民国政府陆军部，事实上也奉有监视小朝廷的使命。禁卫军的存在，使得小朝廷的活动空间更为狭小。鹿钟麟带队入宫时，这些禁卫军一枪不放，就缴械了。

五　小朝廷日常生活再现

由于一重重厚重宫门的阻隔，不但紫禁城内的政治生态迷雾重重，即便是日常生活也颇为神秘，时人、后人透露出来的描绘往往支离破碎。我们有必要将史料加以仔细的拼接缝合，以期再现比较完整的宫中图景。

就民国政府与小朝廷的关系来说，是在不断的磨合、冲突中发展的。1914 年 12 月，袁世凯派内务总长朱启钤、司法总长陆宗祥与小朝廷内务府接洽，商定善后办法七条，就清室纪年、服制、赐谥等方面作出新的规定。民国政府要求小朝廷通用民国纪年，不再使用旧例及旧年号；使用"大清皇帝"名号，以物为限，其他所有赐谥等项荣典禁止使用。对此，小朝廷并不认可，暗中抵制，在内部文书中仍然使用宣统年号，并且向效忠清室之人颁赐名号或谥号。

经济上的困窘使得小朝廷不能不在事实上对以往隆重繁琐的典章礼仪实行简化。1915 年，按照惯例，宗

1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第 1958 页，中华书局，1993 年。

2　参见李国雄口述、王庆祥编：《伴驾生涯》，载《长春文史资料》第 26 辑，第 5 ～ 7 页，1988 年；该书由工人出版社 1989 年正式出版。

3　杨毅炎等编：《北京兵变始末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二），第 21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图七　西装革履的溥仪

人府即将重修谱牒，但经费短缺，迟至 1920 年才成立玉牒处。1922 年溥仪大婚前夕，挑选后妃的制度也做了重大变通，不再由皇帝当面确定后妃人选，而改为皇帝看待选女子的照片画圈挑选。以往王公大臣面见皇帝，必须跪地问答。小朝廷改行皇帝赐坐、君臣坐而论道的制度。

小朝廷仍然要维持皇家日常生活的体面，同时还要对王公大臣、遗老遗少和个别社会知名人士予以赏赐，但财源的拮据迫使小朝廷在某些方面节流。1924 年 5 月，溥仪出示端午节赏赐表单，预计花费三万元，郑孝胥提议节去千元以上的部分[1]。同时，小朝廷也开始采取开源措施，有目的地向外界开放自己的专属空间，例如内务府和民国政府协商，有条件地将颐和园开放，内务府可得门票收入的三分之二。金梁提出开放紫禁城部分区域，将文物古董加以陈列，设立“皇室博览馆”，收取门票，增加收入。[2] 但此议尚未落实，溥仪就被驱逐出宫了。

虽然溥仪在时尚生活上有花费无度的现象，但他对宫廷财力短绌也心知肚明。为此他要求王公大臣开源节流。1924 年 3 月，郑孝胥向溥仪建议裁减经费至六十万元，溥仪答称：“只可限以五十万，如能再省至每年四十余万更好。”[3] 当年他甚至向郑孝胥谈到裁撤御膳房的打算。[4] 但总的来看，小朝廷的节约措施收效不大，每每为超支苦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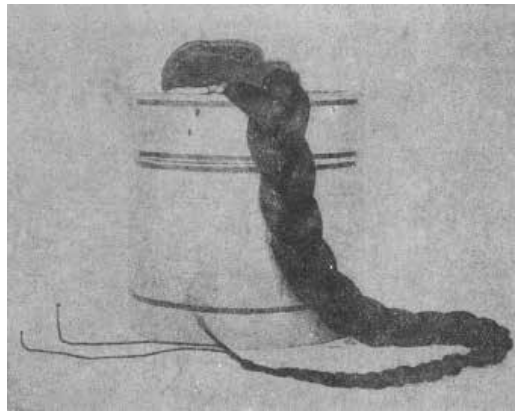
虽然小朝廷宗室遗老希望尽可能沿袭传统生活方式，但外部时尚生活信息仍然不断冲破守旧王公大臣的阻挠，闯入小朝廷的日常生活。溥仪、溥杰等人对北京流行的各种时尚十分向往，西式膳食的引进就突出表现了他们对时尚的追求。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北京街头已经出现“华洋饮馔任人餐”的景象。[5] 溥仪年龄稍长，喜好西式餐饮，命令内务府成立“番菜房”，聘请西餐厨师进宫。面包、咖啡和牛排之类开始成为“御膳”内容。

西式服饰、日用品也成为小朝廷时尚生活的重要内容。溥仪本人订制西装〔图七〕，命内务府根据画报广告信息，购买时尚物品如钻石、怀表、表链、领带等。紫禁城内部分起居空间也发生变化。溥仪命人在养心殿内铺装地板，陈设西式家具。1924 年 7 月，溥仪购买两辆汽车，携眷游览西山八大处，郑孝胥向溥仪进谏：“西山之游侍从太多，用费太奢，时候太晚。”[6] 溥仪和年轻亲贵子弟在学习英文的同时，还互相起英文名字。当然，这种时尚主要限于年轻成员，中老年王公大臣和太妃大都保持传统生活样式。

在日常生活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部分小朝廷成员的观念也开始背离传统，程度不等地接受新观念。虽然溥仪及其兄弟子侄在宫廷里接受正规的皇家教育，但他们对这种刻板的教育没有好感，更多地倾向于活泼

1 参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第 2001 页，中华书局，1993 年。
2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94 页，群众出版社，1964 年。
3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第 1990 页，中华书局，1993 年。
4 参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第 1991 页，中华书局，1993 年。
5 兰陵忧患生：《京华百二竹枝词》，载路工选编：《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第 138 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
6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四），第 2008 页，中华书局，1993 年。

生动的英文教育。庄士敦经常向溥仪讲述欧洲绅士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观念的改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溥仪后来回忆道："他教的不是英文，或者说，英文倒不重要，他更注意的是教育我像个他所说的英国绅士那样的人。"[1] 前述溥仪等人的宫廷时尚生活就是新观念影响的结果。婉容在大婚前，也曾接受过父亲荣源聘请的外籍家庭教师的英文教育，故与溥仪在生活观念上比较接近，尽管后来夫妻二人以分居而告终。



图八　溥仪剪下的发辫

溥仪甚至萌生和胞弟溥杰离开北京、出国游历的念头。正如庄士敦所说："年轻的满族皇帝渴望了解紫禁城之外的那个世界。"[2]1924 年 2 月，溥仪兄弟与荷兰公使欧登科联络，买通看守宫门的太监，准备潜出神武门，前往东交民巷的荷兰公使馆，最终被载沣得知并阻拦。

相比之下，小朝廷的中老年成员则比较守旧，即使是曾经出过洋的载沣也对近代科技持有怀疑。当庄士敦建议溥仪佩戴近视眼镜时，王公大臣一片哗然。观念的对立势必引发矛盾。溥仪对师傅梁鼎芬鄙视近代卫生习惯，拒不洗澡的陋习很是反感。一次，梁鼎芬上课时腹中不适，向溥仪表示"告外"（上厕所）。溥仪故作不懂"告外"之意，延宕时间，使梁鼎芬当场便溺失禁，尴尬不已[3]。

观念的变化也直接作用到小朝廷成员的身体外观上，最明显的莫过于青年成员的主动剪辫。民国政府曾经颁布剪除发辫的法令，内务部曾数度致函小朝廷内务府，劝说宫廷中人集体剪辫。甚至一度采取强制手段，在小朝廷里造成不小的恐慌。然而，小朝廷敷衍以对。张勋复辟期间，溥仪留着发辫"重登大宝"。随着年龄渐长，溥仪对发辫的认同感急剧下降，开始意识到发辫是丑陋和落后的象征。特别是当溥仪从庄士敦那里得知西方人对"猪尾巴"（pigtail）的讥讽之后，下决心在宫中实行剪辫〔图八〕。短短几天，从青年亲贵到太监，都剪掉了辫子，只有陈宝琛等"帝师"和几名内务府大臣仍然留着发辫。剪辫之举使小朝廷成员在身体符号上淡化了与外界社会的区别，但这仅是从审美观考虑的，并非小朝廷由衷接受民国政治秩序的结果。

清朝灭亡直接改变了小朝廷与北京市民的社会关系。原先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在民国体制下，都是公民，法理上彼此平等。尽管小朝廷不可能如此认识——溥仪直到被驱逐出宫时，才面对鹿仲麟等人说出今后愿意做公民的话来。十二年间，小朝廷与北京市民的关系比较融洽，除了张勋复辟曾经给北京市民带来惊扰外，北京市民对小朝廷的存在未持反感态度，更没有将其看做威胁[4]。直到冯玉祥政变，小朝廷在北京没有受到政治冲击，即使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和紫禁城只有咫尺之遥，但群情激奋的学生从未冲击过小朝廷。[5] 北京市民把小朝廷看作是失势的老邻居，或许是更为恰当的比喻吧。

1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75 页，群众出版社，1964 年。

2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 208 页，求是出版社，1989 年。

3　杨照远、刘晓晖：《溥仪外记》，第 21 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年。

4　复辟期间，小朝廷力图呈现自我约束并宽宥臣民的姿态，如颁布谕旨称："皇室经费，仍照所定每年四百万元数目，按年拨用不得丝毫增加。……凡我臣民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自便。"见张赣盦：《复辟详志》，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三），第 61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5　也有遗老把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政治危机看作是复辟良机，当时正在上海的郑孝胥就对邹嘉来说："使我执政，先行三事：禁结党、封报馆、停学堂，皆以丘山之力施之，使莫敢犯，不过一年，天下朝觐，讴歌皆集于我矣。"见《郑孝胥日记》（四），第 1787 页，中华书局，1993 年。



图九　泰戈尔送给溥仪的画像

在比较怀旧的市民心中，小朝廷的存在多少能使他们感到一些荣耀。有个入宫维修电灯的电工向溥仪请求爵号的事情就很能说明这一现象。一次，溥仪在宫中学骑自行车，一名电工下跪请安，请求赏赐爵号。溥仪就用北京蹲桥头的乞丐的诨名，封这名电工为“镇桥侯（猴）”。结果，这名电工真的跑到内务府索要“官诰”[1]。1923 年 12 月，溥仪大婚典礼举行时，北京市民争相观睹，互相传告：“走！瞧小皇上娶娘娘去。”[2] 仪仗所过之处，人山人海，万头攒动。

1923 年，裁撤大部分太监的溥仪从北京市民中招雇体格健全的男童入宫从事体力劳动。一些与宫廷多少有联系的市民就托人走门路，把孩子送进宫中，侍奉“宣统皇帝”。前面提到的李国雄原名李光平，其父李嵩智曾在颐和园銮仪卫当差。辛亥革命后，李嵩智在北京宝钞胡同定居，以捏泥人为生。闻知小朝廷将招雇男童，就忙把李国雄送入皇宫当差[3]。

对小朝廷而言，北京市民对自己的宽容远比民国政府的“优待”要实心实意。张勋复辟期间，由于黎元洪拒绝交出大总统印玺，陈宝琛气愤不过，要求溥仪将黎元洪“赐死”。溥仪表示反对：“我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民国不是也优待过我吗？”[4] 但小朝廷把市民对民国政府的不满看作是人心思旧的表现，这种误判加深了小朝廷的复辟情结。

正是观念的变化导致宫门渐开。小朝廷曾多次邀请中外社会名流进宫参观交流，戏剧界如杨小楼、谭鑫培和梅兰芳等，学界如胡适等人都曾入宫面谒溥仪。1924 年 4 月，溥仪在宫中接见了来华访问讲学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图九〕。溥仪举行大婚时，各国公使及夫人都入宫出席婚典。1922 年，端康太妃回家省亲时，曾接见著名洋商哈同和夫人罗迦陵。据其侄儿唐海炘称，端康太妃曾封哈同为“一品官”，罗迦陵为“一品诰命夫人”[5]。关于端康太妃赐封之事的真实性，皇室后裔溥仲（载润次子）提出异议，认为清宫素来不准后妃干预朝政，更不可能随口赐封[6]。孰是孰非，尚难断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小朝廷不仅跟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颇有来往，而且跟外国民间人士也有交往。这种交往无形中为日本人的介入敞开了大门。

小朝廷还通过参与慈善活动来改善自己的形象。溥仪根据某位师傅的指点，看到报纸上有赈济灾民的消息，就将捐款送到报社，或是直接送到贫民家中。这些善举的确引起了报刊媒体的关注，以至报纸上屡屡出现“宣统帝施助善款待领”的消息。1923 年 12 月，《平报》甚至以《时事小言，皇恩浩荡》为题，肯定了溥仪的善举，并讽刺当时军阀政客的吝啬：“惟民国之军阀无不坐拥巨款，且不见有一救济慈善者，于此可更

1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69 页，群众出版社，1964 年。
2 丁燕石编：《落日残照——溥仪和他的后妃近臣》，第 157 页，档案出版社，1988 年。
3 参见李国雄口述、王庆祥编：《伴驾生涯》，载《长春文史资料》第 26 辑，第 5 ～ 7 页，1988 年。
4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61 页，群众出版社，1964 年。
5 唐海炘：《回忆我的姑母——珍妃、瑾妃》，载《文史资料选辑》第 18 辑，第 183 页，1983 年。
6 爱新觉罗·溥仲：《对〈回忆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的意见》，载《文史资料选辑》第 24 辑，第 303 页，1985 年。

见宣统帝之皇恩浩荡也。”[1] 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后，小朝廷以溥仪的名义向日本捐送了价值 30 万美元的古玩字画。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代表大正天皇进宫致谢。

然而，有限的社会交往和对外开放虽然局部改善了小朝廷的社会形象，却不能使小朝廷真正打破与北京市民社会之间的藩篱。

六　危机的孕育

小朝廷在北京的生活并非风平浪静。皇室优待条件明文规定“皇族具有与国民同等的权利”，但种种情形表明，小朝廷无意争取宪政体制内的合法权利，基本游离于宪政体制之外。很明显，在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复辟的幽灵一直萦绕于小朝廷核心人物的脑海。

从北洋时期的政治法律实践来看，民国政府虽然没有规定小朝廷是否享有法律豁免权，但是仍然给予照顾，尽管这种照顾仅限于一定额度的拨款、免除纳税义务等方面；皇室优待条件实际上为小朝廷制造了一个相对隔绝、相对自由的空间；民国政府也没有制定一个遏制清室复辟的具体方案。

就小朝廷来说，从天上掉到地上的现实也造就了心理上的巨大落差。进入民国，小朝廷在北京的活动空间遭到严重分割，并处于持续萎缩的状态。正如当时一首竹枝词所叹惋的那样：

朱邸纷纷闭落晖，当年门巷故乌衣。
天涯春草明年绿，未识王孙归不归[2]。

原来的满汉隔离被打破，内城已经不再是旗人的独占之地。根据优待条件，小朝廷保留紫禁城的后半部、太庙、颐和园。什刹海周围的王公府邸、遵化和易县的东西两陵名义上也属于皇室。但这些场所互不连贯，造成了活动空间的阻隔。紫禁城前庭（亦称“外廷”）各殿成为小朝廷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1922 年 11 月，溥仪大婚，按常例必须通过前庭中线诸道大门，但民国政府仅破例允准婉容“凤舆”从东华门进入。

袁世凯当政时，一度打算将小朝廷自紫禁城迁置颐和园。袁氏筹办帝制时，迁居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但不久袁世凯病亡，迁居之事就没了下文——其中也包含民国政府防止小朝廷借移居颐和园之机出逃塞外的深度考虑。在这种限制下，溥仪极少前往京郊。

民初中央政权被北洋集团控制十余年，历届政府要人大多系清朝文武官员，他们对逊清小朝廷礼遇有加。这种情形使小朝廷误以为他们“不忘故主”，复辟有望。实际上，这些要人不过是为了避免背上屠戮前朝君臣的罪名。除了张勋之外，北洋军人大都没有扶助溥仪恢复大统的打算。1917 年 7 月，张勋率数千“辫子兵”入京，驱逐黎元洪，扶持溥仪复辟，不数日间就被“旧臣”段祺瑞扑灭，小朝廷依靠北洋旧臣实现复辟的梦想告一段落。

1　秋隐：《时言小事，皇恩浩荡》，《平报》1923 年 12 月 15 日。
2　姜泣群：《朝野新谭》，第 68 页，光华编辑社，1914 年。



图一〇 溥仪的乳母王连寿



图一一 大太监张谦和

1919 年，徐世昌继任大总统，小朝廷再次活跃，“北京街上的旗人的大马车、两把头又多起来了。贵族家里又大张旗鼓地做寿、唱戏、摆宴。热闹起来了，并办起了什么‘贵族票友会’、什么‘俱乐部’。”[1] 甚至少数担任政府公职的前清官员也对溥仪行跪拜礼。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进宫祝贺溥仪大婚时，先是以民国官员身份行鞠躬礼，然后自称“奴才”，向溥仪叩首[2]。

徐世昌下台后，小朝廷与民国政府的关系复趋于紧张，国会议员屡屡提出废止优待清室的提案。内务部针对小朝廷接连变卖宫内文物古玩的行径，制定了《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案》。即使没有冯玉祥政变，民国政府也有可能以另外的方式最终废除对小朝廷的优待。进一步而言，民国政治复杂，形势严峻，人物各异，出宫后的溥仪已经失去偷安的可能，时刻面临种种不公、不幸的遭遇，加上日本等方面的诱惑，逃离民国、建立伪国（自以为复辟得逞），是迟早之事。

溥仪是整个小朝廷的中心人物，也是最具有悲剧性的人物。他虽然富有个性（日常事务的任性），但却无法摆脱小朝廷社会的影响（对外面世界所知了了，形同木偶）。直到离开紫禁城前夕，溥仪仍处于社会化严重不足的状态。缺乏家庭亲情关爱的溥仪十分依赖乳母王二嫫（宫中称为“王连寿”）〔图一〇〕，直到少年时期，仍然要求王二嫫给他解怀哺乳。一次，大太监张谦和（人称“大德张”）〔图一一〕在宫中看到王二嫫给当时已九岁的溥仪哺乳，就用略带讽刺意味的语气劝说溥仪注意自己的年龄。岂料，溥仪竟然命人杖责这个已经年近六旬的太监。后来，张谦和与其他太监被驱逐出宫。溥仪为了避免旁人窥见自己“进哺”的情景，就给王二嫫定制了一件宽大袍服。这样，他只要把头伸进王二嫫大袍之中，就可以毫无顾忌地“进哺”了。溥仪出宫后，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心理上的严重依赖——后来溥仪无法摆脱日本人全面而细致的控制也可以说是这种依赖性的表现[3]。

进而言之，溥仪这种社会化不足的弱点，也为他顺利接受新中

1 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67 页，群众出版社，1964 年。

2 参见溥仪：《我的前半生》，第 84 页，群众出版社，1964 年。

3 仅就溥仪、溥杰兄弟而言，他们的社会化过程，根据生活地点的变化可以划分为：北京紫禁城时期、天津张园时期、伪满长春时期、伯力战俘营时期、抚顺战犯改造所时期、北京文史馆时期。在不同时期，他们的身份也从小朝廷君臣、租界寓公、伪满君臣、苏军战俘、伪满战犯，直到新中国公民。溥仪兄弟的成功改造，固然是战犯改造政策的结果，也是建国初意识形态的强大力量使得人们在思想行为上都被高度同质化的结果。

国的改造提供了一定基础，没有出现类似其他顽固战犯抗拒改造的现象，最终得以名列第一批特赦名单——这或许是溥仪本人的幸运吧！

结 语

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来看，宣统帝溥仪退位揭开了世界范围内帝国连锁崩溃的大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都相继覆灭。这些帝国的皇帝无一留居首都，要么仓皇出逃，要么遭到杀戮，例如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属被苏俄政府秘密枪杀。与同时代的废黜帝王相比，溥仪及其小朝廷相对幸运，能够留居故宫安然度日——虽然是有限度的，也是暂时的。

小朝廷之政治社会生活的断裂和重组虽然都带有无奈的色彩，但是却在客观上维护了一个社会群体的稳定。除了张勋复辟，小朝廷总体上是以比较平和恬静的形象出现于北京社会的。其间，由于新观念的渗入，富有多重意义的身体符号——辫子——在短时间内从小朝廷大多数成员头上剃去。大批裁撤太监也使长达数千年的宦官制度加速走向坟墓。单就这两个意义非凡的事件而言，小朝廷的社会重组是应当得到肯定的。但是，挥之不去的复辟情结、高墙的隔绝与缺少社会责任感（无力扶助贫困旗人、保护宫廷文物）使得小朝廷无法真正融入到外界世俗社会之中。

就民国政府而言，未能引导小朝廷的良性发展，反而设置对小朝廷的种种限制是值得深思的。1924 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并不是辛亥革命反清事业的继续，也无助于反复辟斗争，结果只是再次造成小朝廷社会生活的断裂，并且孕育出新的危机——国内的压制与国外的引诱，使得小朝廷重新燃起复辟的希望。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赵中男）